



经济文化教育
学科建设丛书

中国近代文学史证

——郭长海学术文集

Z G J D W X S Z

JINGJIWENHUA
JIAOYUXUEKE
JIANSHE
CONGSHU

(下册)



吴晓峰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
推荐书目

中国近代文学史证

——新文学运动的大潮

夏志清、曹湜、夏含夷 著

夏志清 (C. T. Hsia)

曹湜 (Cao Zhi)

夏含夷 (Xia Hany)

夏志清 曹湜 夏含夷 著

1998



夏志清 曹湜 夏含夷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史证

——郭长海学术文集

下 册

吴晓峰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

主 编:吴晓峰

责任编辑:贺 萍 封面设计:徐 扬 责任校对:李 焱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时风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34.25 字数:8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815-8

版 次:2005年3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 000册 定 价:68.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南社研究

· 考证篇 ·

《马君武诗选》讹误简析

马君武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翻译家，又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诗人。他的1卷《马君武诗稿》，在辛亥革命之后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广西民族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马君武诗选》一书，所收内容，以《马君武诗稿》为主，又补充了马君武在抗战前后的一些诗作，共120多首，附译诗4组，大体上反映了马君武诗歌创作的全貌。应该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读者是会欢迎的。

我在仔细阅读了这本诗选以后，感到遗憾的是：书中出现的错讹太多。这不仅无助于对马君武诗歌的了解和研究，甚至会妨碍人们对马君武这位诗人的认识和评价。下边分几个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关于马君武诗的写作年代问题

任何一本诗选，尤其是古代的诗选，需要对入选的作品在写作年代上作出具体的说明，目的是有助于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进一步的了解。而这种年代的标明必须是具体的、可靠的。《马君武诗选》的编者没有这样，书中标明的马君武诗的写作年代是非常混乱的，甚至是极不准确的。

1. 题解中列出的年代和书后所附年谱中列出的年代互相矛盾，如下页表中所示，可见在同一本书中，前后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是很惊人的：

诗题 (有些用简称)	题解中年代	年谱中年代
送某君行	1900年	1904年
杭州拜岳武穆王墓	1903年冬	1904年
西湖	1903年	1904年
偕谢无量游杭州	1902年冬	1904年
禹陵	1903年初	1903年冬
寄生虫	1904年	1905年
伊豆杂感	1906年	1902年
京都寄宿舍	1906年	1904年
岚山观樱	1906年	1904年
七思	1906年	1905年
地球	1906年	1905年
去国辞	1906年	1907年
赠虞君	1907年	1905年

2. 某些诗词系年有误。例如：《地球》，题解云，作于1906年，年谱为1905年，均误。查《政艺通报》，甲辰第四号（1904年4月16日）已载此诗，可知此诗必定作于此前。

《杭州拜岳武穆王墓》题解为1903年秋，年谱为1904年，均误。查《政艺通报》癸卯第15号（1903年9月6日），有署名剑客的一首诗，题为《癸卯三月再谒岳王墓，时与桂林马君武，会稽马君浮偕》，正是记此次共同游历之事，剑客即王无生。诗题所标时间最为准确。

《去国辞》，题解云作于1906年，年谱云作于1907年，均误。《大陆报》第二年第16号（1904年11月26日）已载马君武《与祖国告别之辞》即此诗，知必作于1904年之前。

《变雅楼三十年诗征题词》，题解云：作于1910年，误。按：《变雅楼三十年诗征》是高旭编辑的一部时人的诗选集，1913年开始编辑，向时人广泛征求题词。当时在德国留学的马君武于

1914年复信高旭，并寄来了题词，故知该诗作于1914年。

3. 编选者没有认真地查对《马君武诗稿》。《马君武诗稿》是采用了按体裁来编排这样一种传统的方式，因此每首诗都有年代可考。所不同的是，不是把年代注于每首之下，而是把写于同一年的几首诗排在一起，只在第一首下注明年代，其余几首就不再注。乍看起来，好像只有第一首有年代可查，其他几首就没有了年代。《马君武诗选》的编选者就是这样对待的。结果造成《马君武诗选》和《马君武诗稿》年代相乖者达十几首之多，如下表所示：

诗题（有些用简称）	马君武诗稿	马君武诗选
伊豆杂感	1903年	1906年
去国辞	1903年	1906年
赠虞君	1906年	1907年
隐元和尚生日	1903年	1906年
岚山观樱	1903年	1906年
拉沙儿	1903年	1906年
京都荒神桥	1903年	1906年
七思	1904年	1906年
地球	1904年	1906年
重到	1907年	1910年
波恩	1907年	1910年
乘电舟至格明	1907年	1911年
多尔维	1907年	1911年
宿延姆斯	1907年	1911年
逢中山先生	1907年	1909年

如果编者对《马君武诗稿》的目录作一番很好的研究和分析，那么，在系年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关于诗选中的注释问题

编选古代诗歌，注释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历史事件、人物的征引和说明典故的来源以及注释上。关于这一点，可以说这本书的编选者是有所注意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典故的注释。但马君武是近代诗人，又到过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诗中除了引用一些中国古代的典故外，还涉及一些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传说、人物等方面的知识。如果忽略了这些问题，也会使注释出现错误，严重的甚至会对原诗有所歪曲。《马君武诗选》的问题恰恰就表现在这里。举例如下：

（一）关于外国方面

1. 《壁他利亚》诗注云：“壁他利亚，是希腊神话九个文艺女神中司颂歌的女神，总是坐在岩石上冥想。”诗中有句云：“雌雄牝牡万千族，都以壁他利亚生”，这与司颂歌的女神及其冥想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作出上面的解释，显然是不通的。编选者将“壁他利亚”一词的英文原文注为 polyhymnin，并对译成汉语，注为玻力欣尼亚，实际上，错误就发生在这里。

按：“壁他利亚”一词在《马君武诗稿》中没有英文或日文注音，但根据“壁他利亚”一词的汉语发音情况，以及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意思，到外文中文查考，得知英文中与“壁他利亚”发音相近的一个词是 bacteria，原意有“细菌”、“生物有机体”、“原生物”诸义，与原诗中所说万物都由此而发生的意义正相合，所以“壁他利亚”一词，不能解为司颂歌的女神。

2. 《壬寅春送梁任父之美洲》之第2首有句云：“春风别卢骚，秋雨病罗兰”，“罗兰”注云：“即罗曼罗兰，法国大文豪”。

按：这里所说罗兰，并非后来的大文学家罗兰，当时出名的罗兰应当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普拉特·罗兰。罗曼·罗兰当时还未成名，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马

君武写完此诗后的两年才问世，因此，马君武不可能将罗曼·罗兰与梁启超作对比。普拉特·罗兰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人物，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曾流亡各地。这里马君武是用普拉特·罗兰的流亡事迹来比喻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选注者还说马君武是以罗兰自喻，非也。

3.《伊豆杂感》第5首有句云：“且饮寒冰杂比儿”，注云：“饮寒冰，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此说也误。“饮冰室”与“饮寒冰”是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

按：此诗是伤时感世、以酒浇愁之作，与梁启超无关。关键是在“比儿”二字上面，选注者不知此二字之所指，未加注释，故于全诗未得解释，于是便望文生义地把饮寒冰与饮冰室联一起。实际上，“比儿”云云，即今之啤酒，英文名“BEER”，日文名“ビール”，当时音译为“比儿”。此句是说：暂且喝下一杯浸有寒冰的啤酒，用来消除一下胸中的积热吧。这样就通顺得多了。

4.《拉沙儿》诗题解云：“学生们参加拉沙劳动并进行演说，故称拉沙儿”。这种理解全误。这又是望文生义的结果，实际全诗与拉沙劳动根本就没有关系。

按：诗中首二句云“劳动团中演说归，女郎争识拉沙儿”，说的是一位女郎去劳动团中演讲归来，“女郎争识”即“争识女郎”，拉沙儿则是人们对这位女郎的称呼。后两句是说：“掷来玫瑰数千束，今日花香真满衣。”这是指女郎的演说引起轰动，观众向这位女演说家投掷鲜花，报以热烈欢迎的情景。拉沙儿，这里指法国的一位女演员，今译拉萨尔。据《辞海》介绍说：“法国女演员，幼年在街头卖唱，1838年参加法兰西喜剧院，以扮演高乃依的《贺拉斯》、拉辛的《费德尔》、《巴耶塞特》等剧中的主要角色著称。她为响应法国1848年2月革命，曾将《马赛曲》搬上舞台。”她的杰出演技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

人们常常投以鲜花表示欢迎。马君武在该诗中，用拉萨尔的名字及其受欢迎的事实来比喻一位善于演讲的女郎，说她所受到欢迎如同拉萨尔一样。拉沙劳动云云是丝毫也扯不上的。

5.《贺高剑公新婚》诗中有句云：“只今更说偷通族，地球到处立新国”，注云：“偷通族，英国一民族”。

按：偷通应为条顿的音译。条顿族为日耳曼人的一支，往往以此指代日耳曼人。

6.《自上海至马赛途中得诗十首》之八《亚丁》诗，有句云：“创教摩诃末，屯兵英格伦”，注云：“摩诃末”，亦称“花刺子模汗”。下文举其历年征战情况。此注误。因为“花刺子模汗”与诗中所说创教云，全无联系，而且花刺子模汗当年活动地区主要在中亚和伊朗高原一带，不在阿拉伯半岛，而亚丁港恰恰在阿拉伯半岛上，相距较远，故知其必有误。

按：此处所说，“摩诃末”应即默罕默德的另一译音。默罕默德为回教的创始人，“创教”云云正是指此，他的活动地区正是在阿拉伯地区，亚丁港也包括其中。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当年创立了回教的默罕默德所活动的地区，如今都被英国殖民者侵占了。这是有感于今昔盛衰的慨叹。若解为花刺子模汗，则相去甚远了。

7. 同上诗第10首《别中国公学学生》诗中有句云：“莫说鹿儿岛，西乡愧未能。”注云：“西乡，指中国”。选注者以为中国在日本之西，西乡当然是中国了。但当时马君武写此诗时正在上海，西乡云云，未必西指。

按：此处西乡乃是人名，即日人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鹿儿岛人，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曾参加倒幕活动，对促成明治维新而使日本走向强盛起了很大作用。马君武在诗中勉励中国公学的学生们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做出贡献，并以西乡隆盛为例，说明后人一定要超前人。

8. 《Coln》一诗，注云，“即波恩”。

按：此注全误，此诗题应译为科隆。诗中所述高塔、残堞等等，都是科隆的名胜古迹。波恩和科隆两个城市在德文里的写法有很明显的区别，只要稍查一下有关的德文词典或中文《辞海》，就可以解决这样一个常识问题。这也是不应当出现的错误。

9. 该书注解中3次提到日本政府公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的时间，都说是1906年。误。

按：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11月2日公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管理规则》，即通称《取缔留学生规则》，共15条，当即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对。12月4日至5日，中国留日学生全体罢课，要求修改并撤回该规则。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杀。12月14日，大批留日学生开始罢学归国，至年末。1906年春，归国学生在上海组成中国公学，以安顿归国的留学生。注释说1906年春才公布该规则，是不符合事实的。又：该书还说日本订此留学生取缔规则以后，将中国学生遣送回国，也与实际不符。当时日本政府并无此种行动，而是中国留学生自动采取的归国行动。

以上9条所说都为有关外国方面的错误。

(二) 关于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

其实诗选在涉及本国历史或人物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1. 《伊豆杂感》之四有句云：“为载沧州张溥来”，《诗选》注云：“张溥，明代太仓人，字天如，崇祯间进士……组织复社……。”编者似乎未注意沧州（在河北省）与太仓（在江苏省）的区别，似乎也未注意到，明代有一个张溥，时人也有一个张溥。

按：此处之张溥，实际指今人张继，作者的友人，与三百年前的张天如毫无瓜葛。《马君武诗稿》于此诗末有注云：“溥泉，今更名继”，本来是很清楚的。编者未查对原书，作了别出心

裁的解释，恰恰发生了错误。张继，原名溥，字溥泉，河北沧州人，清末留学日本，后返国参加黄兴、宋教仁领导的湖南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参加同盟会后，与保皇党人相争甚烈。民国，为国民党中著名活动家。晚年主持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及国史馆等工作。张继在日本留学时期，与马君武相交甚笃。这首诗是写张继在国内参加革命活动，马君武在日本盼望他归来的情况。若指为明代张溥，便与上下句不相连属，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2. 《七思》之一《慈母》有诗句云：“他乡知交稀，乞米恐无处”，注云：“诗人家素贫，马母时常借米维持生活，今马母迁居上海，故言。”此注纯就字面而言，虽不为错，但未必贴切。

按：古诗中常用“乞米”一词，此典源于唐人颜真卿，他有一书信手迹名《与李太保帖》，内容是说，生活贫困，常向友人乞求以度日，帖中有句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故令报告，惠及少米，……。”后人不称此贴原名，径称为《乞米帖》。因此，乞米只是形容度日艰难，后来就成了借贷的代名词，不能坐实为“借米度日”。

3. 《〈变雅楼三十年诗征〉题词》一诗注释云：“1901年，革命党人高旭写成诗集《变雅楼三十年诗征》……。”观此，《变雅楼三十年诗征》似为高旭所创作诗的结集，实际上并非如此。

按：《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并非高旭的诗集，他的诗集名《未济庐诗集》和《变雅楼诗》（后来都收入《天梅遗集》一书中）。至于《变雅楼三十年诗征》一书，是高旭所编辑的一部时人诗选集，所收内容为近30年来“新旧遽嬗，思潮消长”在诗歌领域中的反映，是为“伤史亡而作《诗征》”（高旭自述语）。1913年高旭把编辑此书的意见（包括凡例若干条、自序、题词各一首）寄给在德国的马君武，请为题词。马君武在回信中说：“题词及报诗二纸奉寄，不作诗近三年矣，勉强笑颦，必不工，

勿谓为幸！”信中所说题词即此诗。

4.《哀沈阳》其四，有句云：“杨郭前尘事可伤，长城自坏哭辽阳”，注云：“杨，杨业，号无敌，太原人，……郭，郭子仪，唐时华州人。……”，以下叙二人平生战绩。这是明显地误认郭、杨为历史人物。

按：这应当是与现实有关的两个人物，杨、郭即原奉系两个著名的将领：杨宇霆、郭松龄。杨宇霆原为奉军参谋长、著名的亲日派人物。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将张作霖炸毙于沈阳皇姑屯，杨宇霆即阴谋取张学良自代。事为张学良侦知。张设计将杨捕获并处死。郭松龄于1925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由前线倒戈，回师沈阳。后为张作霖击溃，郭松龄本人为张学良部下所枪杀。“杨郭前尘事可伤”，即指张学良处理此二件事。马君武似觉此二事处理上有些过分，自伤大将，竟使抗战在即，统兵乏人，所以，下句话说：“长城自坏哭辽阳”。若指为杨业、郭子仪，既无可伤之前尘，也无自坏长城之事，又何来哭辽阳之事呢？

又：同诗下句，“豚儿竟自误军国”，“豚儿”一词注云：“国民党军伐”，则所误就更远了。这里“豚儿”分明是指张学良，联系下句云：“还认情场作战场”，则事实就非常清楚了。当然，对于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绩如何评价，这里且不讲，不过当年马君武确实对张学良曾几度表示不满。因此，这里“豚儿”决不可能是指国民党的军队。

5.《抗日纪事》之二有句云：“五朝文物移新主”，注云：“指黄帝、夏、殷、汉、唐五个朝代”。这个注与诗的内容所去也甚远，因为这里说的是北京。抗日战争时期，北京所存黄帝、夏、殷、汉、唐时期文物，除甲骨文外，可以说没有。其他珍贵文物在抗战初期已被国民党政府装箱南迁，而南迁并非改新主，所以此注有误。

按：这里“五朝”实际上是指辽、金、元、明、清5个朝代，因为这5个朝代都曾建都北京，文物遗迹到处都有留存。北京失守后，这些文物都成了日寇掠夺的对象。“移新主”云云，盖即日本侵略者，而非国民党政府。

综上所述，《马君武诗选》一书的注释，无论在国外或国内的史实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和编选者的望文生义、主观臆断有关系。

三、对马君武事迹的介绍也有不合事实之处

1. 关于马君武编辑《世界月刊》的问题。

按：马君武与谢无量、马浮曾共同编辑过《翻译世界》月刊，不是《世界月刊》，时间是1902年，也不是1904年。

2. 关于马君武担任同盟会秘书长的问题。

按：当时并没有秘书长这种叫法。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下设3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执行部下设6个科，其中第4科为书记科，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处。马君武只是书记科6个成员之一，与陈天华等共同负责起草同盟会纲领草案。不久，因为马君武在京都大学读书，来往不便，便辞去了这一职务，改由别人来接替。

3. 关于马君武代理《新民丛报》主编的问题。

该书编选者认为，1902年在梁启超赴美游历期间，马君武曾代理该报主编。此说误。

马君武初到日本不久，即不断为《新民丛报》撰述稿件，一方面是为糊口，一方面也是出于他对梁启超等人的景仰。1902年春，梁启超出游国外。这时马君武的政治立场正发生转变，逐渐远离康梁转向革命阵营。所以，这时马不可能去主编《新民丛报》，而梁启超也未必那么信任他，把保皇派的喉舌给不是万木草堂出身的一位年青后生主编。实际上主持这一时期《新民丛

报》编辑工作的是蒋智由（观云）。

4. 关于马君武曾担任《民报》主编的问题。

按：《民报》创刊于1905年10月。第1~5期的主编是张继，自第6期起，由章太炎主编。其后因章太炎生病，由陶成章接替，编辑了23、24两期，时间为1908年10月。此时清政府驻日公使馆通过日本政府下令禁止《民报》发行。一年半以后，即1910年2月，汪精卫等人将《民报》复刊，出版了25、26两期，托名在巴黎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现存《民报》1~26期的影印本，每期后边都印有编辑人的名字。至今尚未发现有马君武的署名。

5. 关于马君武参与创办中国公学的问题。

按：中国公学是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公布取缔留学生规则而罢学归国的各省代表共同创办的，创于1906年的春天。1905年冬马君武虽然返国，但不久又返回日本，故而未曾参与中国公学的创办工作。1906年夏，马君武在京都大学毕业归国，出任中国公学的教务长（当时叫总教习）并兼任理化科教授（迄于1907年秋至出国为止）。此时已是中国公学创办半年之后的事了。

6. 关于马君武1909年参与创办南社的问题。

按：南社的实际发起人是三位，即：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时间是在1909年。马君武在两年前，即1907年，已赴德国留学。南社从酝酿、筹备、发起到成立，他都没有机会与闻。因此，马君武是南社发起人的提法是不恰当的。

7. 关于1930年春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问题。

1930年春，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要出国考察，时间较长，便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并荐马君武自代。马君武不愿就职。经反复磋商，并请多人说项，马君武才应允出任该职，时间是在1930年的5月，已经进入夏天了。